

●管继平

可谓工笔见心裁

—叶圣陶致郑逸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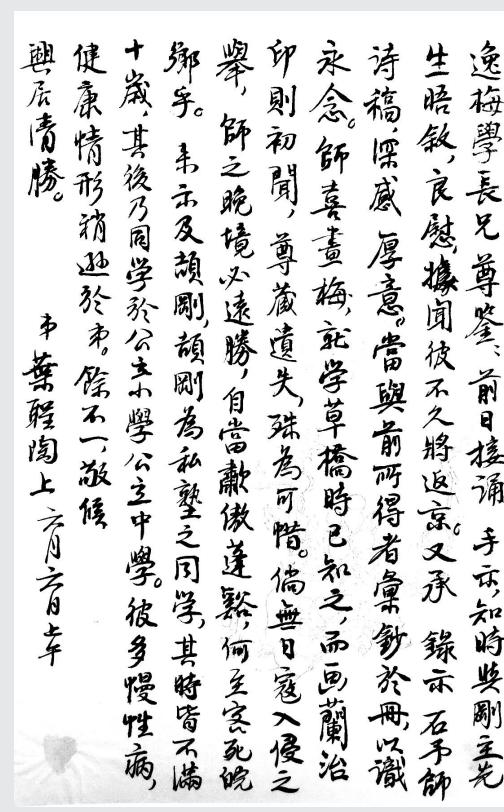
稍涉文坛或喜欢读书的人，一般不会不知道叶圣陶和郑逸梅两位。当然，叶圣陶是五四新文学后的大家，四九年以后又出任高位，我们中小学课本里也有他的作品，如《多收了三五斗》《爬山虎的脚》之类，影响无疑很大。而郑逸梅，人称文史掌故专家，其别具一格的小品文，短小精悍，渊雅含蓄，也深受读者青睐。且郑逸老下笔殷勤，自民国初期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笔耕大半个世纪从未停辍，著述丰赡已逾千万字。在文坛，逸老有“补白大王”之雅号，即报纸上的副刊，排版后无论还缺多少“空白”，只须告诉郑先生需多少字数，他倚马可待，立就一篇短文补上，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逸闻趣事，几乎包罗万象，而且鲜活可诵——逸老就有这样的能耐。

所谓的“补白大王”，若用今天的语境说，或就是“八卦大师”了。这当然缘于郑逸梅先生的交游博而广、读书多而杂。据说以前逸老每次与朋友饭局，随身皆会带一个小本子，听到有什么好玩的故事，他立马拿出本子记下，年长月久，积累日丰。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那本《艺林散叶》，就是逸老仿《世说新语》的风格，写民国以来文人的“八卦新闻”。全书二十多万文字，多为文坛或艺坛的名人轶事，短则十数字，长则不过百来字，集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唯一的缺憾就是该书不分体例，也不按人物归类，只是一股脑地写下来，他人若想检索往往一筹莫展，很是犯难。虽如此但也终究白璧微瑕，《艺林散叶》自出版以来一再重版，至今仍受读者欢迎。说来还有一段往事，就是八十年代我刚开始学作文时，也喜欢写点“豆腐干”的小文章，为此一位语文老师还建议我，不妨学学郑逸梅先生，专门写读书短文，没准以后也可成一家。可逸老腹笥充盈，阅人无数，而我当时一个中学生哪及得上？所以没坚持两下，也就不了了之了。此事现回想起来，老师那样说其实是勉励，我若也那样想可就是不自量力了。

郑逸老除了写作，还有集藏之癖，举凡书画砚石、扇笔竹刻，或是钱币邮票乃至烟标、明信片等，他都喜收集。不过我以为，逸老最钟爱或许还是文人信札的收藏。他说祖父锦庭公以前总喜欢将朋友往来的书札，选一些文笔朴茂，书法端秀的，粘存于册。受祖父之影响，逸老年轻时也将文朋诗友的书札集起，相互传观，引为乐事。后藏癖日深，收藏范围扩大，不再限于只是自己的上款，只要是名人书札都是集藏的对象。于是自民国溯源而上，由清再入明，好在那时价位尚不高，经过数十年搜求寻觅，加之朋友所赠，最多时已达万通左右，其中明代的也有如王守仁、董其昌、文徵明等“大名头”的一二十通！若留至今日是何等的稀罕？可惜“文革”时这些珍稀墨迹尽被抄夺而去，待嗣后归还，所存已不足什之一二，溃不成军矣。

劫后余生，郑逸老不改初衷，收拾“旧山河”又重行搜采，加上抄去归还的，数年后复集有书札二三千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林出版社曾为逸老出版一册《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后收藏家彭长卿整理家藏名札，并请郑逸梅先生写序，也出版了一册《名家书简百通》。限于时代因素，这两本书皆为黑白印刷，且质量粗劣，但在二十多年前，关于名人书札的收藏研究，倒是开了风气之先。

去岁（乙未）秋冬，正值郑逸梅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由逸老之女孙郑有慧女士编订、中华书局出版的《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全色精印，图片仅下原作一等，非常清晰逼真，尤为精彩。书中荟集了二十世纪百多位文化名人的尺牍墨迹，所有书札均是逸老上款，最早的如民国报人李涵秋和诗人金松岑，两通信札均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距今将近一百年了。当然更多的是写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几乎囊括了当时一批名流，以作家书画家居多。太晚了姑且不论，单说民国年间已闻名于文坛的就数不胜数，如包天笑、高吹万、柳亚子、马公愚、范烟桥、叶圣陶、张恨水、周瘦鹃、张伯驹、俞平伯等等。这些书札的面貌，不仅可见逸老之交游，更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书信中所涉及的人物故事，了解或研究那时一批文人的生存状态、相互关联之史料。譬如这一通



叶圣陶致郑逸梅的短札，就稍可述之一二。

逸梅学长兄尊鉴：

前日接诵手示，知时与刚主先生晤叙，良慰，据闻彼不久将返京。又承录示石予师诗稿，深感厚意。当与前所得者汇钞于册，以识永念。师喜画梅，就学草桥时已知之，而画兰治印则初闻，尊藏遗失，殊为可惜。倘无日寇入侵之举，师之晚境必远胜，自当傲然蓬溪，何至客死乡乎。来示及颤刚，颤刚为私塾之同学，其时皆不满十岁，其后乃同学于公立小学公立中学。彼多慢性病，健康情形稍逊于弟。余不一，敬候

兴居清胜。弟叶圣陶上 六月六日上午

叶圣陶与郑逸梅是苏州同乡，而且曾先后就读于苏州草桥中学，如此说，叶、郑俩还有同窗之谊，关系非常亲近。此信叶圣老抬头虽谦虚地称逸梅为“学长兄”，其实叶还比郑高一届。他们有过同一位国文老师，即信中所提到的“石予师”，南社暂宿胡石予先生。胡石予先生是昆山蓬莱人，据云年方十七岁就在蓬莱镇上开馆授徒，后至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草桥中学前身），任教二十余年，弟子数千计，其后颇有成就者如史学家王伯祥、顾颉刚，文学家叶圣陶、范烟桥、郑逸梅，书画家吴湖帆、蒋吟秋，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等，一所中学如此高产名家，应也非偶然吧。当然，这决非一个老师所能为，而是和这所学校的传统以及具有众多良师有关。叶圣陶常说在草桥中学读书时，有几位国文老师非常难忘，一位就是江南名儒胡石予先生，胡先生学识渊博，能诗擅文，柳亚子也叹其诗才敏捷，以“八叉七步”赞誉之。胡先生诗文之外，也染翰丹青，尤喜画梅。故叶圣老在此信中也说到“师喜画梅”，又闻郑逸梅还藏有先生的兰花和印章作品，只是“文革”中散失了。圣老以前不知先生还能绘兰并治印，故对藏品的遗失表示“殊为可惜”。胡石予先生抗战时避乱而至安徽铜陵，后因染细菌性痢疾，医治无效而客死于铜陵章村。此也是圣老甚为痛惋之处，故云“倘无日寇入侵”，“自当傲然蓬溪”。蓬溪亦蓬莱镇之别称，石予先生早年于乡间，就曾汇集同好之作编有《蓬溪诗存》一册行世。

在草桥中学除了胡石予先生，还有孙伯南、程仰苏两位先生，对叶圣陶的影响也很大。孙先生讲课绘声绘色，学生听课如听苏州评弹一样的享受。程先生对段玉裁非“赤诚相见”也。

常佩服，介绍其文字音韵方面的学问也是不厌其详。两位先生虽都是教国文，但两位先生又深谙金石书法及文字之学，精于诗词格律，所以在先生的启发下，其时与叶圣陶同窗的还有王伯祥、顾颉刚，三位好友经常在一起研习书法篆刻，吟诗填词、做对子，既增进了书本以外的学问，又拓宽了学习的视野。

虽然受业于相同的老师，但因各人的天资、兴趣乃至勤奋度的不一，其结果自然也会大相径庭。不过王伯祥、顾颉刚和叶圣陶三位同窗好友，后来在学问上都有出色之建树，这也是非常难得的。王伯祥研文史、顾颉刚辨古史、叶圣陶治文学，尤其是叶圣陶，他在新文学上的成就上，众所周知，已毋庸赘言。就是在书法印章上，相比于其余两位，由于兴趣所致，叶圣陶也同样胜出一筹。

顾颉刚曾说叶圣陶是“富有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没有一件艺术用过苦功，但没有一种作品不饶于天趣”。以顾颉刚对叶圣陶的了解，此言当然是一语中的。正如前面叶圣老的信中所提，他与顾不仅中学时同窗，早在不满十岁读私塾时，他俩也是同学，所以从小玩到老，交情非他人所及。叶圣陶先生书刻之基础，我想主要得益于草桥中学那几位先生的指导。圣老擅长楷书也精于篆书，这正是孙伯南、程仰苏两位先生所推崇的一路。尤其是小篆，圣老取法泰山琅琊台刻石和峄山碑，中规中矩，淳朴端庄，工稳含蓄，仪态万方。他的楷书也古雅秀逸，自成一格。具体的特点是线条老、气息静，有时露锋落笔，如唐人写经一般，但不重捺收笔，而只是重心靠前，再轻轻地一带回锋，倒也别有风致。

通常除了题字以篆书或创作外，叶圣老作书几乎全用楷法，有时书信也是如此。这和他严谨认真的个性以及做了辈子的教师和编辑大有关系。他说当教师写板书，字是写给学生看的；当编辑写稿或改稿，字是写给排字工和校对师傅看的，所以都必须一笔不苟，以免给别人带来不便。同样是写信，因气质秉性的不同，文字的表达以及书风的展露，都会有很大的差异，譬如同样是文人，叶圣陶和柳亚子，若将他俩的书札放在一起，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

《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中共收叶圣陶致郑逸梅书札四通，分别以钢笔和毛笔书写各两通。由于书信仅落某月某日之款，而未署年份，为此向郑有慧老师请教，但她只记得应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而具体哪一年说不确切了。有慧女史擅绘事，年轻时受祖父嘱咐，还画了“红梅图”寄给北京为叶圣老“庆生”，为此圣老专有诗稿回赠：“不效圈圈兼点点，宁于工笔见心裁。承附近良堪喜，重粉轻红没骨梅。”诗稿后圣老题款写道：“有慧女史惠赠红梅小幅，作此奉酬。一九七六年秋，叶圣陶。”

即便是给小友的诗作，叶圣老也是恭楷书之，其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也可谓是“工笔见心裁”了。从此信的书款年月，可推出叶圣陶与郑逸梅通信的大致时期。如上面这通回忆胡石予先生的书札，圣老署款为“六月六日”，据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先生推测，此函应写于一九八二年。因为此信还附有圣老为郑逸梅代表著《艺林散叶》的书名题签，而该书初版恰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虽说这个推断的可能性较大，但笔者以为还不能定论。因为信的开头有一句“知时与刚主先生晤叙”，这位“刚主先生”，即著名史学家和藏书家顾颉刚也。据查谢先生即逝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莫非在这六月期间还时常“晤叙”，“不久将返京”就遽然而逝了？所以说，读书当在“不疑处有疑”，此信是否就写于一九八二年，还应存疑，或再之前一二年的“六月六日”也有可能。

郑逸老与圣老也是数十年之老友，关系非常稔熟。我曾听陆康先生说过一则段子：他小时常去逸老家中串门，说逸老的房间夏天热煞，以前又无空调，所以，逸老总是喜欢赤膊在家写稿。有一次恰逢叶圣陶先生登门过访，圣老穿着衬衫背心，在那蒸笼似的“纸帐铜瓶室”实在受不了。于是逸老建议何不脱去衬衫，索性与他一样罢了。圣老只得照办，两位老友相视笑，戏谓此真乃“赤诚相见”也。

■文人尺牍(十二)

主要看气质

岁末，“主要看气质”五个字弄得微友五更不安。据说，是因为台湾歌手王心凌新专辑的那一张宣传画，绿色的背景衬托着她吃汉堡的复古鬼服造型。有网友说，其造型突出了她的气质，于是，此言传播并火速跟风大量晒图。为何如此火爆刷屏？有心理学家分析，主要是迎合了网友的心理需求，尤其是一些“自拍党”。以前发两张片片，总会被人跟帖做个鬼脸，现在终于找到理由了。其实，转这个贴的人，很多也不知怎么回事，看到别人转，自己也跟着转，美其言：转帖无须理由！那么什么是气质？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气质？一座城市又需要什么样的气质？一位书家也由此演绎：主要看线条。

刘小晴楷书展

《刘小晴楷书展》亮相朵云轩。开幕式那天，主办方可能也没有预料到，会来那么多的观众和“粉丝”。当日，让笔者感受最亲近的可能还是那“刘粉”，也亲眼目睹了什么才叫“粉丝”？“粉丝”就是围着您，问这问那，让您停不下来，让您成为摄影模特儿。73岁的刘老师不累吗？不累那是假。瞧！他始终在以主人家待客似的微笑，和大家打招呼。文布袋陈鹏举说：这就是人格的魅力。在开幕式上，小晴老师说：书法就是一种“游戏”，在“玩”，以玩的心态享受快乐。书法的初心和本意也许就是玩，不过，“玩”要会玩，要像“一瓢”一样，玩出一点点墨情趣，玩出一点点诗情画意，切忌不要瞎玩，玩黑，玩物丧志。

写端正正中国字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中国书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写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怎么理解“写端正正中国字”？笔者以为这事关书法艺术的创作与发展。堂堂正正做人容易理解，端正正正写字就不一定被人理解了。近日，有人认为，端正正正就是把字写端正，写得正正方方。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在实际创作上就发现问题了，他主张大家都去写正书，对行草书觉得“审美疲劳”了。其实，把字写端正正是从宏观而言，强调的是书法之“正道”，书法创作以及书法教育都应认真地遵循书法艺术规律，真正体现出中国书法的精气神来，“书中有道”就是这个道理，书法创作不是写毛笔字。

对外交流

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对外文化交流就没有停止过，尤其在近几年就更为注重了，从上到下，从左至右都在扩展对外文化交流，而且，这种交流已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书法交流也如此，笔者曾写过一篇《闲话书法“走出国门”》，闲扯了书法走出国门哪些事儿，书法走出国门不仅加强了世界对中国书法的了解，而且增强了中国书法在国际文化和艺术中的影响力。毕加索不是曾对张大千说过：“如果我生在中国的话我可能会成为书法家。”不过，笔者也发现在书法交流中，往往多以出境为“线”，出去了就等于交流了，“走出去”是否“走进去”了，也没有什么约束，至于到国外，与有些不懂书法的人或根本就不认识汉字的人怎么交流？是否想过？

互联网+书法

某省推出“互联网+书法”活动，让书法走进群众，百姓可通过扫码、注册、登陆、点题，约请名家创作书法作品，从形式上看已步入“互联网+”，但是否就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互联网+”，笔者觉得“专家”知道。“互联网+”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态模式，并非简单的相加。如果说仅仅以为沾上了互联网就等于“互联网+”了，这也不难怪你我，因为不懂，只能说这是“初级阶段”中的初级认识。“互联网+书法”究竟怎么做？做什么？不是“1+1”的问题，它需要互联网这方面的专家与书家的结合，靠某一方面军去努力可能都是很难完成的。据了解，近日，有一所私立书法学校正在建设互联网书法远程教学，为的是方便那些在偏远山区学习书法的爱好者，至于这种模式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暂不去评说。

送“福”进万家

春节来临，中国书协号召万名书法家开展送“福”进万家公益活动，颇受群众欢迎，也成为一道喜迎新年的文化风景线。不过，笔者也听到一些基层群众说：好是好，这也不过是“一阵春风”。看来，老百姓对送“福”是欢迎的，但对“福”的份量可能还觉得不够，他们期望书法家们常送“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百姓开设书法艺术讲座。看来，“送文化”向“种文化”转变还不够，还需要“育文化”。

清理存储空间

玩“微信”已经两年了，还不知道从“我”进入设置，就可以清理微信存储空间。不知道这是对手机特性了解不够，还是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手机清理之后，明显感到微信页面滚动切换“提速”。手机如此，人的脑子是否也应来一次“清理”。在信息时代，当那良莠杂芜的信息过载时，就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与健康，主宰人的思想情绪。因此，适当清理一下干扰我们大脑的信息“垃圾”和过载的“碎片”，也是必要的。亲！新年了，请从“我”进入设置吧！

周国富

荷净露生香

—难忘与张森先生的一段师生缘

保了学习班进度不受影响。笔者查对当时的上课笔记，确认那天是7月23日，按计划第三讲的课题是执笔法。张先生谈了自己对执笔、用笔等技法的见解，并示范了各种书体的书写笔法。讲到隶书，他提到了《乙瑛》、《曹全》、《张迁》、《礼器》等碑帖，并进行分析。他说，习书者通过简单能较易观察到书法的笔意，通过学习东汉的碑刻则便于了解用笔和结字的技法。

这次学习班的办班方式是：教与学互动相结合；上课与练习相结合，课内教育与课外交互。在当时碑帖短缺的情况下，张森先生采用晒图的方式，为每一位学员印发了《大唐王居士砖塔铭》的晒图本，便于学员们观摩、临写，确是煞费苦心。在学习班中，洋溢着求实、和谐、上进的温馨气氛。笔者记忆犹新的，课余时间不少学员常常带来珍藏的书法作品或论著，以便相互交流学习。笔者就是在学习班期间第一次看到了沈尹默先生的论著——《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当时自己学书情笃，还是足花了两个星期时间将之悉数抄录，以求更深入地学习。此外，张先生还组织学员们去上海博物馆，观看中国古代书法展览。笔者第一次见到了明朝书法大家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书写的巨作，从二楼一直逛到底楼，令我们个个惊叹不已。

笔者每当回眸文化宫这期学习班时就会

联想起五十三、四年前在青年宫参加市书法篆刻研究会创办的二期大型书法学习班。在那二期书法班上，上海的众多名家如潘学固、白蕉、翁同龢、胡问遂、任政等老师为学员们上课，挥毫示范，谆谆相教。连年近80岁的沈尹默先生也亲自带头讲课，提倡人们继承和弘扬书法艺术，将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令听课者无不感奋。如今，当笔者回忆起这两次书法班的经历时，都深深感受到了他们对书法教育工作是如此勤勤恳恳，他们是真正书以载道的文人，是后学者怀念和崇敬的崇高楷模。

求书的幸遇

岁月荏苒，转瞬到了1983年的春天，笔者参加了单位系统的职工书法展，便想到向曾教授过我的张森先生求一幅墨宝，以便学习。于是特地调休半天，赶到了位于岳阳路上的上海中国画院。那天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也大胆地说明了原由。张森先生听后，当即地表示“可以”，并当场书写了一副“竹明风弄影，荷净露生香”的隶书横批。当时自己在旁边看边思，张森先生的书法如此奇妙，令人叹服！笔者喜悦的心情不能自己，索性鼓起勇气，要求张先生能否再写一幅扁面，留作纪念。张先生也没有拒绝，而是含着微笑说，“这样吧，过几天再写吧！”一个星期后，笔者下班回家，从信箱内收

到了一封来自上海中国画院寄来的信函。拆阅后，喜从心起，张森先生诚信重诺，果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张先生在扇面中的写有一句“莫待无花空折枝”，时时提醒自己别让时间白白流逝。直到今天，笔者也逾古稀，时常会将张先生的作品拿出来欣赏，张先生精神奕奕的身影记忆犹新。

令人怀感的书道和人品

1973年10月底，市文化宫书法班结业告一段落，几十年间笔者始终以尊崇与爱戴的心情密切关注着张先生在书艺创作、书学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张先生先后撰写了《用笔析》、《书法品评窥见》、《学书遐想》、《隶书基础知识》等论述，皆有精辟之论。2013年笔者从邻居老画家冯先生处获知：十多年前，当时冯先生尚在甘肃兰州某核工业基地从教，由于汇编画册的需要，想找人题词，抱着试试的心态写信给张先生。张先生看了冯老的画稿集后，不因素昧平生，而不予理睬，而是按时题词相赠，此景令冯老感动不已。不久前，笔者又偶然看到了香港卫视采访张森先生的访谈视频。在访谈中张森先生从自幼对书法的热爱谈起，纵横捭阖地论述、推心置腹地敞言，深深打动了自己。

张森先生从一名已有一定造诣的光学科技人员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上海书法界领军人物之一，这与他几十年来对书艺的挚爱及悟性，对学术理念的坚守，不懈努力和勤奋耕耘分不开的。

同时他的为人也是我们敬佩的。今日重忆42年前市文化宫书法班的往事，心中源源不断地涌出了绵绵的暖意和化不开的浓浓师生情。

78.诗书画印四绝者无，四擅者夥
诗书画印最高者为赵之谦、吴昌硕也。二者书、画、印均开一代风范，每项均可为大家。齐白石画、印大师，诗、书则差矣。至当代，诗已无可比，如若换之以文章，则王镛、石开亦仅占据书、印两项也，达此境已殊为不易。而诗书画印均擅者则多如牛毛也。古来无一人可以四绝，若四绝，则为天才“核心”之“核心”也。

79.政治人格与本性人格

赵孟頫、王铎、张瑞图等“二臣”或“奸臣”为人不齿，吾以为此乃“外在”之政治人格也，非人之本性人格也；吝啬、傲慢、粗鲁、愚笨此“内在”本性之人格也，本性人格有缺陷则有害书艺，而政治人格于书无害也。

80.即时正确，永远错误

任何